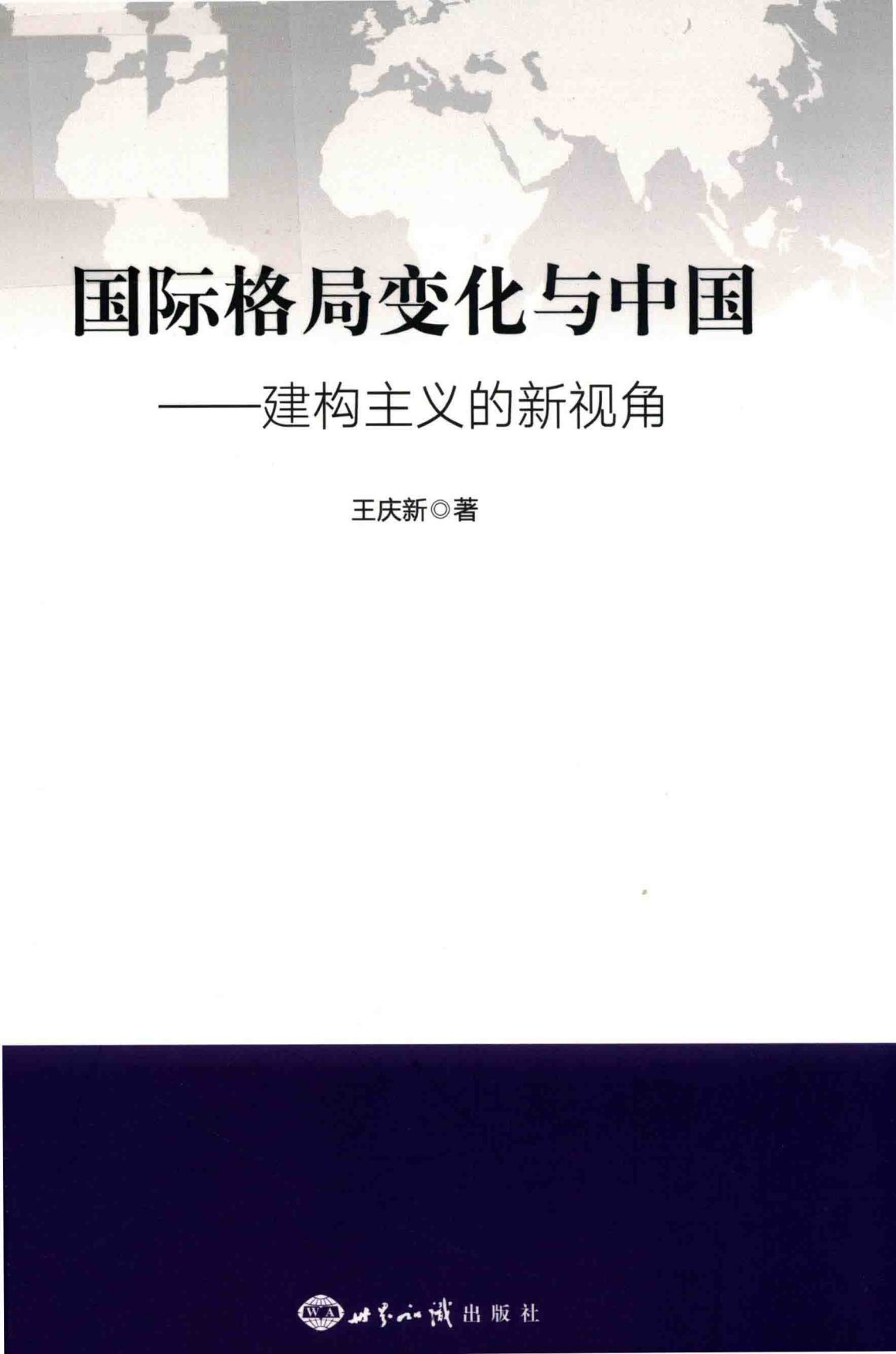




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

——建构主义的新视角

王庆新◎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

——建构主义的新视角

王庆新◎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建构主义理论的新视角 / 王庆新
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9.4

ISBN 978-7-5012-5983-0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中外关系—研究 IV.
①D8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55581号

- | | |
|------|--|
| 书 名 | 国际格局变化与中国——建构主义的新视角
Guoji Geju Bianhua yu Zhongguo: Jiangou Zhuyi de Xinshijiao |
| 作 者 | 王庆新 |
| 责任编辑 | 汪 琴 |
| 责任出版 | 王勇刚 |
| 责任校对 | 马莉娜 |
| 出版发行 | 世界知识出版社 |
| 地址邮编 |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
| 网 址 | www.ishizhi.cn |
| 电 话 | 010-65265923 (发行) 010-85119023 (邮购)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北京虎彩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
| 开本印张 | 170 × 240毫米 1/16 13¼印张 |
| 字 数 | 184千字 |
| 版次印次 | 2019年8月第1版 2019年8月第1次印刷 |
| 标准书号 | ISBN 978-7-5012-5983-0 |
| 定 价 | 58.00元 |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1993年夏天，我走在纽约曼哈顿三十三街的宾夕法尼亚车站附近，正准备去普林斯顿大学的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任职。苏联刚刚崩溃一年多，当时的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显示了欲取代苏联的势头。日本人刚刚收购了洛克菲勒中心和好莱坞的哥伦比亚影视公司，美国媒体一边倒地呼喊美国霸权的衰落和日本崛起所带来的威胁，穿着日本和服的自由女神像出现在《时代》周刊的封面上。也就是这样一个国际背景之下，亨廷顿在《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文明的冲突》一文。

我至今依稀记得当时阅读之后那种震撼，自豪与悲哀相交织的感觉。让我感到震撼的是，西方人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有如此强烈的骄傲和优越感，以及对异族文化的潜在挑战与威胁有深深的恐惧和担忧；让我自豪的是亨廷顿居然将在中国已经濒临消失的儒家文明看作是西方文明的潜在竞争对象；悲哀的是我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却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如此不了解。我也开始感受到了了解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并且推动中西文明之间相互理解和融合的重要性。

我在1995年年底到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而后又转到香港大学任教多年。在此期间，我有机会近距离观察和体验新加坡和其他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香港社会在中西文明相互碰撞和融合的国际环境下的真实生活。这些宝贵的生活和工作经历给予我进一步反思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机会，也给予我更多启发。

二十五年过去了，亨廷顿的文章并没有过时。当年日本崛起对美国的挑战已成为过去式，令人意想不到的，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战后建立的美国霸权体系的潜在挑战者。

实际上，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在近代的地理大发现之后就已经在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拉开了序幕。东南亚和中国东南沿海可以说是中国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接触的最前沿地带。东南亚华人的祖先大都是在西方列强开发和殖民东南亚的时候，从中国东南沿海冒着生命危险乘着大帆船漂洋过海而来的。葡萄牙商人于1535年来到澳门，在那里建立通商口岸。17世纪初荷兰东印度公司在巴达维亚（即印度尼西亚）建立殖民地，并开始将势力延伸到中国东南沿海和中国台湾地区。1633年由郑芝龙领导的料罗湾海战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第一场由文明冲突引发的大规模海战，导致荷兰人从澎湖列岛撤退到台湾岛。1661年的明荷战争中郑成功击败荷军并以将荷军从台湾驱逐出去而告终。

与此同时，明末清初以利玛窦为首的耶稣会教士来到中国，中西文明冲突也具体地体现在文化层面上。有关儒家祖先崇拜和基督教信仰关系的争论（即礼仪之争）是中西文明冲突的本质性体现之一。礼仪之争的影响直到现代在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东南亚华人社会仍然可以感觉到。很多东南亚华人不仅同时掌握中文、英文和马来文，也同时接受祖先崇拜和基督教信仰。正如思想史学家葛兆光所说，近代中国衰落的起始点不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而是在明末清初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以及其他传教士来华带来西方先进思想对中国士大夫思想造成严重冲击之时。^①英国商人于18世纪中叶开始染指马来亚半岛和新加坡，法国人接踵而至，开始在东南半岛扩大势力范围。乾隆时代英国使者马嘎尼的访华，接下来的两次鸦片战争，以及甲午战争，甚至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无不是中西文明冲突和融

①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98—336页。

合的体现与结果。

但是历史并不是简单的线性进程，也不一定会在未来重复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因为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吸取了惨痛的教训。1945年之后的世界不再是那个霍布斯所假定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国际社会也不再是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二战后国际体系主要有三个变化：第一，《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和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的签署标志着所有成员国愿意接受国际规则的约束，国际关系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世界，即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依靠洛克所强调的以法治为基础的国际社会。第二，人类从两次世界大战中认识到人类可以通过拓展国际贸易来追求国家利益，而不是通过战争和土地兼并。因此促进经济发展成为很多新兴国家的主要目标，也成为联合国促进和平的一个主要目标。随之而来的就是战后西欧和日本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经济复苏与繁荣发展。第三，核武器的发明标志着人类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核时代，因为核战争的爆发意味着整个人类物种毁灭的可能。也就是说，核武器的拥有和扩散从此永远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战争规则。战争不再是核大国追求国家利益的主要手段。

建构主义理论的视角即是从这样的历史维度来思考国际关系，它认为国家的外部行为，就像人类个体的行为一样，并不只是受物质利益的驱动，而是受思想、价值和信仰的驱动。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互动因为人类思想、价值和信仰的改变而变化。建构主义认为当不同种族和不同文化的国家和人民拥有构建国际秩序的共同信念和共同价值的时候，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容易，世界和平变得更加可能。这个理想其实与中国古人的大同理想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本书就是从这样一个新视角来思考中国与美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希望能为以现实主义理论为单一思维模式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提供另外一个选择。

我在撰写这本书中的部分文章以及在准备这本书稿的过程中，得到了

很多朋友，同事和同行在不同方面的热心帮助和大力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这些文章和本书就不可能完稿和出版。我要在此特别感谢以下这些朋友对本书一些章节形成过程中所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楚树龙教授、王有强教授、张严冰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阎学通教授和李彬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贾庆国教授、查道炯教授、王勇教授，复旦大学陈志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张蕴岭教授、王玉主教授，外交学院《外交评论》主编陈志瑞教授，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胡伟星教授，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崔大伟（David Zweig）教授，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前院长邓特抗教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柯庆生（Tom Christensen）教授，美国康奈尔大学政府系彼得·卡赞斯坦（Peter Katzenstein）教授，美国马里兰大学政治系玛格丽特·皮尔逊（Margaret Pearson）教授，加拿大滑铁卢大学陈格瑞（Greg Chin）教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鲁斯密（Christian Reus-Smit）教授，以及新西兰奥克兰大学陈杰瑞（Gerald Chan）教授。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领导和其他同事对这本书的关心、支持和提供出版赞助。我还要在此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汪琴副社长和张恽丹编辑。

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在写作过程中难免会有些错误和疏漏，我个人将为这些错误和疏漏负责。

本书收集的文章所发表的出处（按照在本书出现的排列顺序）：

1. “Hegemony and Socialization of Mass Public: The Case of Japan’s Cooperation with the United States on China polic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Vol.29, January 2003.
2. “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中日关系”，《当代亚太》，2007年第5期。
3. “经济意识形态和贸易自由化”，陈志敏等编，《国际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的全球化》，上海三联出版社，2006年。

4. “春秋华夏天下秩序的启示”,《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

5. “Cultural Norms and the Conduct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Richard Hu, Gerald Chan, and Zha Daojiong,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s*, The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1.

6.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和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外交评论》,2016年6月。

导 论.....	1
第一章 理解国际合作与冲突的三大理论.....	19
第二章 理念与霸权：战后日本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的合作.....	31
第三章 现实主义、建构主义和中日关系.....	63
第四章 经济意识形态和贸易自由化 ——解读 1999 年中美入世协议.....	81
第五章 春秋时期华夏天下秩序的维护与对当今世界文明冲突 的启示.....	107
第六章 传统文化规范与现代中国外交.....	135
第七章 儒家王道理想、天下主义与现代国际秩序的未来.....	151
第八章 “一带一路”倡议：机遇与挑战.....	185

导 论

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了世界性霸权秩序，这个霸权秩序包括国际政治军事秩序和国际经济秩序，当时的目的是为了遏制共产主义在全球的扩张。这个国际政治军事经济秩序包括在欧洲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在东北亚建立的美日军事同盟和美韩军事同盟，在东南亚建立类似于北约的东南亚公约组织（SEATO），在南太平洋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建立的军事同盟。国际经济秩序包括关贸总协定（GATT），这个总协定后来被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以及世界银行（World Bank）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①霸权基础特别是美国霸权的基础是很复杂的问题，这是本书第二章和第五章讨论的主要问题。简单地说，任何霸权体系必须有两个重要的基础，第一是霸权国必须有超出其他国家很多的物质实力，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第二是霸权国必须拥有一整套可以为大多数盟国所接受的思想、信念和价值，包括治理国内事务的意识形态与治理国际事务的国际伦理和法律规范。两者缺一不可。也就是说，美国霸权体系的基础包括战后美国超强的军事经济实力，以及为其盟国所接受的建立在基督教文明基础上的一整套理念和价值，包括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及其衍生出来的国际法规范。这些理念和价值为美国霸权体系提供重要的合法性依据，也使得其更加稳定和长久。

^① G.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chapter 2 and 3.

从194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就是中国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中国单独与美国两个国家的关系。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和美国站在对立面。中国被排除在美国所建立的西方国际秩序之外。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接下来的二十年美国拒绝在外交上承认中国，双方基本上没有直接贸易往来。中美在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兵戎相见。十几年后在美国越南战争中，中美虽然没有正面的直接冲突，但是中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提供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双方的敌意直到尼克松总统1969年年初上台才开始有所缓解。

1972年春天尼克松总统访华，正式结束了中美二十年的军事和外交对峙。为了对付苏联在阿富汗和其他地方的扩张行动，美国于1978年断绝了与台湾当局的外交来往，而与中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并建立密切的经济与军事合作关系，西方学者普遍认为中美从此建立了反苏准军事同盟。从此，中国正式开始融入了美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接下来的三十年中美关系发生了突飞猛进的变化。经贸往来迅速发展，文化往来也迅速升温，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是，中国留美学生开始大幅度的增加。

冷战的结束对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和中国东南亚关系带来了新的挑战。冷战时期的美国与苏联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格局变成以美国为中心的一超多强世界格局。在美国出现的有关美国外交走向的大辩论受到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深刻影响，这个大辩论影响了美国政府的外交走向。克林顿政府以民主拓展（democratic enlargement）为基础的外交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相结合的特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目的是回应他的学生弗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的观点。福山认为冷战的终结意味着自由民主制度是人类社会迄今最好的政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将来不再会有意识形态上的强大竞争对手，国际政治从此将会非常的和平、和谐，甚至从无趣到无聊。亨廷顿不

同意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他认为未来国际政治将是围绕着大国捍卫自身的文明传统而展开。他认为文明的冲突与竞争将比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竞争更加残酷和血腥,因为文明之间的差异与冲突是更本质上的差异。文明不仅关乎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更关乎更根本的问题,即每个人的信仰和宗教生活。文明告诉我们是谁,我们如何与身边的亲人和朋友互动,如何开展与亲人和朋友的关系,更重要的是,每个人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每个人心目中的上帝是谁。不同的文明对这些本质性问题都有不同甚至矛盾的答案。人也许可以不参与政治生活,可以不对不同政治制度作选择,但却不可以回避这些有关文明的本质性的问题,不可以不对这些本质性问题作选择而生活。所以这就预示着将来不同文明会因为这些问题而发生激烈冲突。全球化加剧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因为在全球化之前,来自不同文明的人们之间没有很多机会相互接触和互动,不知道不同文明间在本质性问题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他告诫西方人说,西方文明只是基于基督教的一个非常特殊的文明,没有普遍性,自由民主制度也只是特殊的西方文明中的一个特殊表现,西方人不要试图强迫非西方人接受西方文明价值和政治价值。这样做只能加剧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亨廷顿最后预测儒家文明很可能与伊斯兰文明结成联盟,共同对抗西方文明的扩张。^①

亨廷顿的理论在西方学界引起极大的争议,人们对此褒贬不一。亨廷顿理论的一个重要缺点是过分强调文明冲突的不可调和性,认为文明冲突不可避免地最终会导致军事冲突。他认为巴尔干半岛是人类几大文明(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交汇线也是分界线,所以也是火药桶,历史上的几次重大军事冲突都是从巴尔干半岛爆发开始的。他将20世纪90年代的前南斯拉夫的分裂看成是文明冲突导致军事冲突和分裂的

^① Samuel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72, No.3, summer 1993.

最终结果。

二十五年之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又被重新审视。亨廷顿提出的西方文明与儒家文明的可能冲突又被重新提起。随着中国经济近年来的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也在快速增长。自2012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以来，中国在外交上也采取了更加积极主动的策略。中国派出维和部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且开始对非洲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大规模援助。中国海军在非洲的吉布提设立海军基地。2013年之后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构建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并主导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中国的这些重要国际举措获得了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大多数欧盟成员国的热烈响应。

然而，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已经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怀疑与担忧。西方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对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东亚国际秩序构成潜在的挑战和威胁。近年来中国与东亚国家的一些争议，比如与日本围绕钓鱼岛主权的领土纠纷，中国与菲律宾和越南围绕南海问题的领土纠纷，海牙常设仲裁法院有关中菲南海领土争议的裁决，美国海军在南海的持续巡航，以及最近中韩在萨德导弹部署问题上的矛盾都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当年美国政界和学界对日本崛起的担心与忧虑，与当今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与忧虑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不同的是，中国是放大版的日本，而且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等方面与美国有更大的差异。

特朗普总统2016年的当选为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冲击。特朗普的当选得益于近年来美国国内民粹主义的高涨，很多美国人对全球化不满，认为全球化让美国的大量工作流向国外，造成很多美国工人失业，他们希望美国政府能够纠正全球化的偏差，让美国人民从全球化中受益更多。而且“9·11事件”之后，很多美国人开始将伊斯兰世界看作是美国的潜在敌

人，认为美国步入了与伊斯兰国家文明冲突的长久通道。特朗普总统的前首席战略顾问班农（Stephen Banon）更是直接接受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认为伊斯兰和其他非西方国家包括中国正在形成联盟挑战西方文明和西方霸权，中美之间在不久的将来很可能会爆发严重冲突。所以他立志要重整和复兴西方文明的世界主导权（班农的思想会在第八章进一步讨论）。

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12月颁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将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修正主义大国”和主要战略竞争对手。特朗普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于2018年3月颁布的《根据391法案对中国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和创新政策的调查结果》对我国的科技政策和贸易政策，特别是《中国制造2025》作了详细的分析，指责我国贸易和科技产业政策触犯了1974年制定的美国贸易法案第301提案。2018年5月特朗普政府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导致了中美贸易摩擦，以及对中兴和华为等中资企业的围堵，导致了中美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除了经贸问题之外，中美关系还存在着其他隐患，例如朝鲜核问题，台湾问题和网络安全问题等。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在于，中美关系不仅仅体现着两个大国之间在亚洲的国际影响力的竞争，更重要的是中美之间在政治与文化层面还存在着重要的差异，这些差异有可能导致进一步的误解和不信任而加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竞争。

哈佛大学著名国际关系专家，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艾立森（Graham Allison）在最近研究中提出中美两国未来可能面临着严重冲突甚至战争的危险性，也就是掉入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Thucydides）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的名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详细记载了古希腊雅典城邦和斯巴达城邦之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当时的雅典经过50年多年的精心建设和发展，在哲学、艺术、文学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海军力量也得到快速发展，从而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霸权体系。雅典的崛起引起了当时最强大的陆地城邦斯巴达的担心和怀疑，导致了历时二十多年的伯罗奔尼撒战

争。修昔底德将战争归因于雅典的崛起和斯巴达的担忧与恐惧。他特别强调雅典崛起为雅典人所带来的自信和骄傲的膨胀，雅典人对过去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和侮辱的记忆，以及雅典人要求修改过去所签订的不公平条约的主张。斯巴达人对雅典人的要求感到深深的担心和忧虑，认为雅典崛起会不可避免地挑战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保持了一百多年的陆地霸权秩序，这些担忧与恐惧最终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也就是说，雅典和斯巴达之间的实力消长导致两者之间的相互怀疑和恐惧，最终导致战争。史学家将这个现象称为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s trap）。

艾立森的研究发现在过去五百年中人类共经历过16次新兴大国的崛起，其中12次的崛起导致了守成国与新兴国的战争。这些战争包括英国17世纪的崛起与荷兰的战争和后来与法国在欧洲和美洲的战争，拿破仑法国的崛起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战争，俄国在19世纪中叶的崛起与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战争，德国在19世纪后半叶的民族统一而与法国的战争，日本明治维新之后在19世纪末的崛起与中国和俄国的战争，德国在20世纪初的崛起与英国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与美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崛起与美国发生的太平洋战争等。其中4次新兴国家崛起没有与守成国发生战争。它们包括，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没有导致与守成国英国的战争，苏联在冷战初期的崛起没有导致与美国的战争，日本在20世纪70年代的崛起没有导致与苏联的战争，还有德国20世纪90年代因德国统一而崛起但没有发生与英国和法国的战争。

按照他的说法，第一次世界大战实际上是一群表兄弟之间战争。当时谁也没有想到战争的可能性。在1910年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去世的葬礼上，当时的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询问爱德华七世的外甥同时也是德国国王威廉二世，英国与德国日益加剧的海军军备赛是否有可能导致两国的战争。威廉二世回答说，“我基本上是在英国长大的，我生命的一部分就是英国人，而且我热爱英国”。言下之意，他根本不相信英国与德国之间

会爆发战争。谁会想到四年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艾立森提醒说，中美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虽然没有任何美国人或中国人愿意看到中美之间发生战争。他认为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要比现在很多人所想象的可能性要大很多。^①

在当今中美关系急剧变化的背景之下，中国如何在争取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加强与美国的合作进而推动中美关系的稳定发展？中国如何在稳定中美关系的基础上重新定位中国的国际地位？中美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以儒家文明为基础的中国如何避免中西文明的冲突并促进中西文明的相融与会通？中国在国际上如何提高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这些重要问题关乎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发展与伟大复兴，也挑战着中国人的智慧。这些问题不仅是中国政界和学界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世界很多国家所关心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正是本书所关注和讨论的主要问题和焦点。

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要强调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中的建构主义理论在当今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应用价值，强调建构主义理论的逻辑有助于缓解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矛盾与冲突，以及对中西文明融合与会通的启发意义。

建构主义理论是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三大理论之一，它强烈质疑和挑战现实主义理论的逻辑。建构主义学者认为现实主义理论有不少逻辑缺陷。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缺点是错误地将国家实力看作是影响国家外部行为的主要因素，看作是构建和维系国际秩序的主要或唯一力量，而忽视观念性因素如信念、价值、规范（norm）和国家身份认同（identity）对国家外部行为的影响，忽视国家之间对共同国际伦理规范和共同价值的认同。也就是说，建构主义认为国家实力不是影响国家外部行为的主要因素，国

① Graham Allison, "The Thucydides's Trap: Are the U.S. and China headed for War?" *The Atlantic*, September 24, 2015.

家间实力的消长并不一定导致国际冲突与战争。而国家之间的共同信念、共同价值、共同国际规范和共同的国际身份认同才是影响和制约国家外部行为的主要因素。

建构主义认为任何国际秩序主要是建立在国家之间对国际规范的相互承认与认同的基础上，并与军事实力相结合的结果，而军事实力不是建立国际秩序的唯一力量。正如本书的第五章和第七章所讨论的，春秋时期的华夏天下秩序和现代国际秩序，以及战后以西方文明共同体为基础的美国霸权体系都是建立在当时流行的国际伦理规范共识和军事实力相结合的基础上的，而不是完全依靠军事实力。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建构主义认为以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建立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制度通过改变国家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增加对国际规范的相互遵守，从而增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这要归因于现代主权国家制度导致国家之间相互承认政府的合法性和政府所控制的疆域的合法性以及互不侵犯和互不干涉等国际规范。二战之后多国签订的《联合国宪章》进一步修订和阐释这些国际规范和国际法，进一步强化了联合国成员国对这些国际规则的认可和遵守，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当国家之间的关系建立在这样相互认可的国际规范的基础上，国家之间的信任与合作就大大增强，而不一定受国家之间国力消长的影响。

建构主义对未来中美关系有很大启示意义。建构主义的逻辑可能有助于缓和甚至化解未来中西文明冲突。建构主义认为国家身份认同和价值认同既可能导致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也可能化解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很大的局限性，它过分强调文明之间的冲突，而没有看到不同文明之间相互融合、交汇和合作的可能性。建构主义认为虽然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确实发生过文明大冲突，比如十字军东征，以及冷战之后南斯拉夫的瓦解。但是这些冲突只是人类历史进程的非常态。人